



問題飲酒 與親密關係暴力女性倖存者

劉珠利

壹、研究背景

親密關係暴力意指有感情與關係的男女間發生身體上、精神上、經濟上的騷擾、控制、威脅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且是需要公權力介入的事件（衛生福利部，2018a.）。不論是文獻或是社會工作實務工作經驗，都顯示「飲酒」和親密關係暴力有密不可分的糾結關係，甚至是高度相關的關係（Caetano, Nelson & Cunradi, 2001; Hankin, Smith, Daugherty & Houry, 2010; Lipsky, Caetano, Field & Larkin, 2005; Pengpid & Peltzer, 2017）。針對這種狀況，臺灣家庭暴力防治系統也提出相關回應的措施，針對女性倖存者的協助項目中，未見任何與酒癮有關的項目，但是針對加害人的處遇方法中，則有有關協助處理酒癮的項目。又，根據臺灣衛生福利部保護司的加害人處遇計畫項目顯示，處遇治療項目中以精神治療為最多，戒酒癮位居第二；認知教育輔導項目中，以一般認知教育為最多，戒酒教育位居第二，從前

面的處遇項目統計證實了，施暴者喝酒是親密關係發生的主要成因（衛生福利部保護司，2018b），且現階段臺灣協助解決飲酒問題的方案以男性施暴者為對象（陳筱萍，曹桂榮，周煌智，黃志中，吳慈恩，2008）。

一般而言，社會的看法與實務工作的發現都指出，親密關係暴力且交纏著喝酒問題的個案，施暴者通常都是喝酒的男性，而受暴者通常是不喝酒的女性，然而 Lemon, Verhoek-Oftedahl and Donnelly (2002) 整理許多文獻後指出，相較於經驗非親密關係暴力創傷事件的女性倖存者，親密關係暴力女性倖存者明顯有較高比例的人飲酒；遭遇親密關係暴力的女性倖存者比沒有遭遇親密關係暴力的女性，更容易酗酒（未免贅述，此部分將於文獻探討段落再行呈現），這是一個在西方親密關係暴力實務工作上，已經引起關注的問題，喝酒男性是施暴者的思維不再是親密關係暴力與飲酒的實務工作圖像。

在臺灣家庭暴力防治實務工作中同樣陸續發現，親密關係暴力女性倖存者本身也有飲酒的問題，是一個在親密關係暴力領域中，需要加以理解與關注的問題。可惜的是在目前臺灣家庭暴力防治中心的通報表上，如果施暴者和倖存者單一方或是雙方都有飲酒問題，而他們之間發生的親密關係暴力問題與飲酒問題有關，社工員在通報表中均只勾選通報原因為「酗酒」（研究者與第一線家庭暴力防治社工員詢問，社工員表示僅會以文字加註女性倖存者有飲酒問題），無法進一步區辨其中的複雜關係，當然也無法產生任何統計數據可以呈現女性倖存者與飲酒問題的狀況。

既然實務工作者有以上的發現，那麼飲酒與親密關係暴力間的脈絡為何？臺灣女性倖存者飲酒和她們所遭遇的親密關係暴力之間的經驗如何釐清耙梳？為了找到答案，筆者搜尋了臺灣各類期刊電子資料庫，僅發現陳秋瑩、王增勇、林美薰、楊翠娟、宋鴻樟(2006)以臺灣原住民婦女為對象的一篇相關研究，研究指出酒癮使得臺灣原住民婦女遭遇親密關係暴力的機會顯著增加，但是無法解釋酒癮和臺灣原住民女性倖存者遭遇親密關係暴力的因果時序關係。因此目前臺灣尚無相關研究或是文獻可以回答這個問題，但是歐美國家倒是累積一些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將於文獻探討部分呈現）。從統計數據來說，親密關係暴力倖存者以女性居多是不爭的事實，女性在社會上位處相對弱勢的位置使得女性倖存者有獨特需要，飲酒與親密關係暴力女性倖存者是在研究上缺乏、但

是卻是實務工作中新興的、逐漸增加的議題。飲酒一直是親密關係暴力防治工作中令實務工作者頭痛與感到無力的問題，當女性倖存者的飲酒問題能夠被釐清因果時序，親密關係暴力實務工作將會更有成效。綜合前述背景，本文擬回答下列問題：親密關係暴力女性倖存者問題飲酒相關成因與可行的處遇方法為何？本文期待從整理西方相關文獻與理論發現對照臺灣相關文獻，進而從比較中了解/釐清親密關係暴力女性倖存者問題飲酒與遭遇親密關係暴力的經驗脈絡，並從這樣的釐清結果發展協助有問題飲酒行為的親密關係暴力女性倖存者之社會工作實務原則。

貳、問題飲酒的定義

飲酒是一個複雜的問題，牽涉社會文化對於飲酒的規範與論述，牽涉生理心理層面的依賴，也牽涉生理層面的耐受性與損傷等，是一個兼具生理，心理，社會層面相互交錯的問題。根據美國國家酒精濫用與酒癮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 on Alcohol Abuse and Alcoholism) 定義，飲酒可以分為好幾個層次：適度飲酒 (moderate drinking)、爛醉 (binge drinking)、重度飲酒 (heavy drinking)；適度飲酒意指女性一天最多飲用一杯男性一天最多飲用2杯酒，爛醉意指在同一場合(約2小時)中女性飲用超過4杯酒男性飲用超過5杯酒，重度飲酒意指在過去一個月中，有超過5天以上喝的爛醉 (National Institute on Alcohol Abuse and Alcoholism, 2018)。前述這三種情況可以統稱為問題

飲酒 (problem drinking)，意即前述狀況的飲酒會導致飲酒者身體，精神，社交生活與職業上的傷害 (RehabCenter.net, 2018)。容易成為問題飲酒者包括創傷的倖存者，因為問題飲酒者視飲酒是因應個人問題的方式，但是事實上飲酒解決不了任何事情 (RehabCenter.net, 2018)。當問題飲酒變的更為嚴重，已經因為無法控制的飲酒而產生腦部病變，當不喝酒就會產生負面的情緒時，就是酒精使用違常 (Alcohol Use Disorder, 簡稱AUD)，也就是酒癮 (Alcoholism) 或是酒精濫用 (Alcohol Abuse) (RehabCenter.net, 2018)。前述幾種不同程度的飲酒狀況，除了適度飲酒之外，其他情況都可能引發親密關係暴力問題的發生 (Lesch & Adams, 2016)，也同時可能發生其他問題，例如：失業，收入不穩定等而形成多重問題的困境。從定義中大致可以瞭解到問題飲酒的複雜程度。

同時筆者在閱讀西方有關於親密關係暴力女性倖存者的因應方式文獻時，發現多數的文獻都集中於理解女性問題飲酒與親密關係暴力間的複雜交錯狀況，討論酒精使用違常 (AUD) 與親密關係暴力女性倖存者的文獻非常少，從前述的定義可以解釋這個情況，因為問題飲酒是創傷倖存者的因應方式，是屬於倖存者尚能夠「正常」因應問題，然而酒精使用違常 (AUD) 已經造成不同程度的腦部損傷以及症狀，必需符合 DSM-IV 的診斷標準才能給予的診斷，是最為嚴重的狀況，腦部損傷同時還會產生其他醫療方面問題進而增加釐清

親密關係暴力脈絡的複雜度。對第一線親密關係暴力防治實務工作者而言，問題飲酒是較符合實務需要的範圍。同時本文也採用學術上較為精準、有明確定義的「問題飲酒」一詞代替目前臺灣實務工作上使用的「酗酒」一詞。

參、臺灣不同性別的飲酒盛行率與臺灣文化對於女性飲酒的態度

世界各國的文化對不同性別的人飲酒幾乎都有不同的標準，對男性飲酒都抱持這是再平常不過的事，甚至是男性在社交場合必要的行為 (Lesch & Adams, 2016)，而對女性飲酒卻視為是喪失優雅的事 (Jacob & Jacob, 2016)，如果女性進而遭遇暴力或是被侵犯，通常會以女性需要為此負責的論述來描述與分析 (Meyer, 2010)，顯示許多文化都有不容許女性喝酒的規範 (Bogren, 2011)。臺灣的文化也反應相同的規範：臺灣社會傳統中，社會文化所塑造的性別角色規範，多數要求男性表現出陽剛特性，女性要表現陰柔特性，喝酒就是一種男性表現陽剛特性的方式，也是一種男性參與社會的方式，也是男性解決憂鬱的途徑 (平語晨, 2018)。因為飲酒是男性陽剛的表現，被要求遵守陰柔特質的女性就不可以喝酒，因為女性飲酒就逾越女性性別角色規範。以下的數據與文獻就顯現這種性別角色規範。

根據梁振翊、周肇茂、何佩珊、謝天渝和楊奕馨 (2004) 在西元 2001 年，針對

臺灣 23 個縣市及原住民地區進行家庭訪問，調查年滿 18 歲以上共 11,723 人的飲酒狀況，結果顯示，臺灣地區曾有飲酒習慣者，男性占 13.9%，女性占 1.0%，原住民的飲酒盛行率則在 22.1%~29.7%；再以人口變項來分析，有飲酒習慣者以 35-64 歲、已婚、國中畢業者為多，男性的職業涵蓋半技術、非技術、高級專業或行政人員、大企業主等，女性以從事半技術 / 非技術工人及無業、技術性工人的行業為主。此外，國家衛生研究院 (2018) 的資料顯示，在西元 2005 年的臺灣飲酒盛行率調查中，受訪者中 53% 的男性與 24% 的女性在過去一個月中曾經喝過酒，其中 15% 的青壯年在過去一個月有喝醉的經驗。雖然有關臺灣不同性別的人的飲酒盛行率的研究不多，但是從前述兩個研究資料顯示，臺灣喝酒或是 / 有問題飲酒的人，以男性居多。

雖然國家衛生研究院 (2018) 指出，不同性別的人因為身體狀況對於酒精的耐受性不同，女性的酒精耐受性較差，因此飲酒的比例不同，這是單純從生理因素角度的解釋。然而光從生理因素來理解不同性別的飲酒行為是有其侷限性的，社會文化對不同性別的人的飲酒行為有其不同的標準，同樣會使得不同性別的人的飲酒盛行率大為不同。邱泯科 (2014) 以質性研究方法深入探討中產階級女性在選擇茶或是酒精時的思考，發現受訪的中產階級女性在飲酒方面的擔憂與顧忌非常多，擔憂的並不是酒精對身體不好，而是擔憂圍繞在女性飲酒所可能承受的社會壓力與傷

害上，例如：喝醉酒失態對女性是非常嚴重且失禮失德的事，有違性別角色規範，妨礙扮演賢妻良母的角色，為了扮演好社會接納的女性角色，就必需節制飲酒，並非不喜歡飲酒。因此飲酒不是只是喝酒這麼單純的行為，反而是實踐性別角色的方法。足見社會文化規範對於不同性別從事飲酒，尤其是女性飲酒，扮演非常具影響力的元素，因此討論飲酒時不可忽略社會文化因素。

既然女性飲酒在社會文化規範的壓力下是有限制的，而且社會文化會污名化有問題飲酒的女性，為何女性在這種情況下還會產生問題飲酒的情形？和遭遇親密關係暴力的問題有何關係？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肆、親密關係暴力女性倖存者產生問題飲酒成因解釋與實證研究

既然多數文化對於女性飲酒抱持不容許的態度，那麼問題飲酒與親密關係暴力女性倖存者之間的關係如何解釋？西方文獻的觀點一併整理如下：

一、飲酒是女性親密關係暴力倖存者的因應與自我療癒的方式

Barnett and Fagan (1993), Devroes, Child, Bacchus, Mak, Falder, Graham, Watts and Heise (2013), Lemon et al. (2002), Lipsky, Kernic, Qiu, Wright

and Hasin (2014), Shannon, Logan, Cole and Walker (2008)以及Ullman and Sigurvinsdottir (2015) 針對親密關係暴力的男女雙方進行的研究都指出，女性都是在遭遇親密關係暴力後才開始飲酒的，證實飲酒是女性因應受暴經驗的方法，久之就形成問題飲酒。但是研究還指出親密關係暴力與女性倖存者飲酒還有其他情況是必須深入分析，才能真正了解問題，這些情況是：親密關係肢體暴力是引發問題飲酒最主要的類型，以飲酒來因應親密關係暴力的女性倖存者，當時都伴隨有生活上的壓力以及情緒上的憂鬱；因此單純飲酒本身不是引發親密關係暴力的原因，關係的衝突才是主要癥結。簡言之，女性親密關係暴力倖存者在無法處理受暴問題時，就以飲酒作為自我療癒受暴經驗的方式，倖存者以飲酒來隔離因為遭受親密關係暴力所帶來的惡劣情緒與創傷，雖然長期遭遇肢體暴力與選擇飲酒來因應問題是問題，但是真正的癥結點是在雙方的關係上，真實地指出兩人關係及因應方式才是需要處理的重點。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為何某些親密關係暴力女性倖存者會採取飲酒來因應？她們覺得效果如何？Jacob and Jacob (2016) 以質性研究方法訪問 10 名參加酒癮戒酒匿名團體的女性，發現她們多數來自失功能的原生家庭，缺乏使用正向因應問題方法的資源，也沒有機會被教導正向因應問題的方法，從小也暴露在家人飲酒的情況下，當她們無法解決問題，或是遇到性侵害等創傷問題時，就會採取飲酒來因應問

題，在重度飲酒的狀態下，讓她們癱瘓遭遇身體或是言語虐待的痛苦，讓她們暫時逃避或是遺忘痛苦。因此這個研究也指出，這類型女性倖存者通常是長期暴露在有飲酒的環境之中，且缺乏其他因應親密關係暴力的方法、資源與認知的人，這是值得實務工作者關注的部分。

二、女性倖存者的問題飲酒與受到親密關係暴力對待容易形成一個無止盡的循環

女性飲酒是造成親密關係暴力的危險因子，同時親密關係暴力也是引發問題飲酒的危險因子，問題飲酒與親密關係暴力兩者之間是循環的關係 (Chervenak & Peralta, 2011)。為何兩者之間會形成一個無止盡的循環呢？Kaysen, Dillworth, Simpson, Waldrop, Larimer and Resick (2007) 認為重度飲酒的女性倖存者比輕度飲酒女性倖存者有較嚴重的情緒問題，包括驚慌，焦慮，害怕，焦躁不安等情緒，女性倖存者是以飲酒來處理這些情緒的產生，在高度惡劣情緒狀態下，僅能以酒的力量來麻痺自己的感覺，然而問題從未獲得解決。又，在不容許女性飲酒的地方，若有女性飲酒就容易產生關係衝突進而遭遇親密關係暴力，顯示出女性採取不符合文化上規範的因應行為企圖因應暴力，卻反過來又再度成為被暴力處罰的理由，讓飲酒成為問題的焦點，關係的衝突就不再成為該關注與處理的問題，並正當化男性的暴力行為 (Temple, Weston, Stuart & Marshall, 2008)。重複同樣的受暴後喝

酒，喝酒後又受暴的循環，顯示女性倖存者一旦開始飲酒，就會陷入一個無解的情境。打破這樣的循環也是這類女性倖存者的難題。

三、女性倖存者在童年時經歷創傷經驗或是成長於失功能的家庭，因為早年經驗讓女性倖存者累積許多脆弱 (vulnerability)，讓她們即使成年了仍然缺乏能力處理創傷經驗，使得她們在遭遇親密關係暴力之後，採用飲酒來處理創傷。

這個角度強調的是女性倖存者的童年創傷經驗與採用問題飲酒來因應之間的關係。而且創傷經驗的強度與持續程度愈高，女性倖存者採用問題飲酒來因應的比例愈高，甚至超過男性。Clark and Foy (2000) 也在整理許多實證研究後，以成長過程中有創傷經驗、成人時期遭遇親密關係暴力女性倖存者與問題飲酒之間的關係進行研究，以 78 位被安置於庇護中心的親密關係暴力女性倖存者，年齡平均為 32 歲，通曉英文者為研究對象，以問卷收集資料，結果顯示，女性倖存者遭遇親密關係暴力程度愈嚴重，問題飲酒狀況也愈嚴重；女性倖存者童年時期遭遇性侵害經驗與其母親有飲酒問題，是預測女性倖存者是否會飲酒的重要變項，換言之，遭遇性侵害是極具創傷的經驗，因此容易以飲酒來麻痺惡劣情緒，而女性倖存者會模仿觀察在遭遇親密關係暴力情境下，母親以飲酒來因應的行為，當她們自己遭遇親密關係暴力時，就容易複製以飲酒來因應的行

為。再次呼應這類型女性倖存者缺乏正向的因應方法。

四、女性問題飲酒與同時為施暴者與倖存者雙重身分

少數文獻指出女性飲酒讓自己同時成為施暴者與倖存者雙重身分 (Cohen, McCrady, Epsteom & Cook, 2010; Sprunger, Echardt & Parrott, 2015; Wiersma, Cleveland, Herrera & Fischer, 2010)，讓我們理解問題飲酒與親密關係暴力之間最難釐清的脈絡。

Wiersma et al. (2010) 指出多數研究都集中於瞭解親密關係中單獨某一方有問題飲酒，研究多數都忽略了兩人都有飲酒的狀況下互為施暴者與倖存者，因此 Wiersma et al. (2010) 就以美國一個大型有關青少年健康相關資料的資料庫 The National longitudinal Study of Adolescent Health 中的 1,507 對親密關係伴侶 (含已婚、同居、約會關係) 為對象進行次級資料分析，結果發現，其中有飲酒狀況的人約占全部樣本的 1/4，而男女雙方都有飲酒的狀況下，女性通常都是因為男性伴侶的行為 (例如：口語或是精神的暴力) 而採取暴力行動來自我防衛，在這種情況下女性同時為倖存者與施暴者，研究最後總結，酒精不是直接引發親密關係暴力的主因，親密關係的本質才是引發問題的癥結。Cohen et al. (2010) 也指出女性如果在飲酒之後先行對男性伴侶施以暴力，是有可能挑起男性伴侶以更大的暴力反擊，

女性最後成為施暴者與倖存者雙重身分。Sprunger et al. (2015) 以男女伴侶雙方互為施暴者與倖存者的親密關係為研究主題，發現女性並不是因為問題飲酒而引發暴力行為，反而是因為無法控制憤怒而採取暴力行為。

雖然有關女性問題飲酒並成為施暴者與倖存者雙重身分的實證研究並不多，但是少數的研究都似乎都指出女性有問題飲酒時，即使對男性伴侶暴力相向，都是在自己先受到男性伴侶暴力攻擊在先，或者是自己先攻擊男性伴侶引起更大的暴力回擊，亦即，女性在問題飲酒狀況下，容易成為親密關係暴力的倖存者，或是同時兼具倖存者與施暴者雙重身分，但是不會單純成為親密關係的施暴者；當只有男性伴侶有問題飲酒又施暴時，不會喝酒的女性伴侶就成為親密關係暴力倖存者或是極端憤怒下反擊，男性在這種情況下，不會成為只是倖存者的角色；同時成為施暴者與倖存者也使得法律問題非常複雜。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釐清，顯示性別在問題飲酒與親密關係暴力方面，是極為關鍵的因素，男性不會只是倖存者，女性不會只是施暴者。

簡言之，前述所有文獻指出，飲酒不會引起親密關係暴力，而是關係已經惡化在先然後在飲酒催化下引發親密關係暴力，而飲酒又成為因應親密關係暴力創傷的方法，在女性倖存者飲酒然後被暴力對待是正當理由的論述下，然後又引發更嚴重的親密關係暴力以及施暴者與倖存者雙重身

分問題。這種兼具施暴者與受害者並有問題飲酒的女性倖存者中，人際關係的處理與發展正向的因應方法依然是重點所在。

伍、問題飲酒的處遇方法

針對前述的研究結果，只有提出成因的解釋，缺乏具體的實務工作原則。有鑑於此，筆者嘗試從全面完整 (holistic intervention) 的方法、社會束縛理論 (social traps theory) 觀點以及逃避的因應方式 (avoidance coping)，找出實務工作上可行的處遇方向。誠如前述背景中說明的，問題飲酒是一個由生理、心理、社會因素交錯形成的問題，前述三個理論觀點集中於關注社會、心理因素所造成飲酒問題的處遇方法，全面完整的方法並兼顧性別 (女性) 的角度，適合社會工作人員採用協助有問題飲酒的親密關係暴力女性倖存者的角度。

Covington (2008) 認為，由於女性的成癮問題通常和生命歷程中的創傷經驗相互交纏，甚至也因此誘發精神方面的問題，由於問題的因果關係交錯複雜，因此單一的處遇方法就不可能產生明顯的協助效果，全面完整的處遇方法 (holistic intervention) 才是最佳的處遇方法。何謂全面完整的處遇方法? Covington (2008) 的定義是：結合不同理論的觀點構成一個全面的理論架構，然後從這個多面向的理論架構發展出處遇的方法。Covington (2008) 就以人際文化理論 (relational cultural theory)、成癮理論 (addiction

theory)、以及健康復原管理模式 (behavior health recovery management) 的觀點共同形成理解女性成癮問題。人際文化理論認為，人際間如果能夠相互同理，情感相互交流，就能夠促進女性成長，所以女性的性別角色特質就是注重人際關係的特質，然而如果女性在人際關係中受到創傷卻又無法離開這個關係，就只好採用負面方式因應，喝酒就是一種因應方式；成癮理論指出，女性的社會心理發展過程是重視人際間的互動與關係，女性通常是因為家人或是朋友喝酒，在這樣環境下一起喝酒而形成酒癮問題。健康復原管理的概念則指出，女性成癮問題不能只聚焦處理症狀，還必須擴及圍繞女性成癮問題的相關議題或者困擾成癮女性的問題，亦即，處遇的原則是擴展至處理女性生命中的議題。結合這三個理論，處理女性飲酒成癮問題不能處理飲酒這個行為，而是要處理女性的人際衝突因應方式。具體的協助策略就是以人際文化理論所提出的協助策略：與女性倖存者建立相互情感交流、相互同理的助人關係，在這個助人關係中討論目前面對人際關係衝突時的因應策略與後果，擬出可行的正向的因應策略選項，協助女性倖存者選擇正向的因應方式並實踐。

此外，有飲酒成癮問題的女性都有創傷的問題，因此 Covington (2008) 也結合創傷照顧理論的概念 (任何精神、酒癮問題都是創傷經驗的反應) 以及相關處遇方法 (從接案、處遇、安置、結案都必須因應考慮女性的創傷反應而加以調整作法)，納入協助飲酒成癮女性的處遇過程之中。

西元1973年美國心理學家John Platt參考行為學派的概念提出社會束縛理論 (social traps theory)，理論的核心概念是：人們會因為某種行為可以獲取短暫的快樂，而開始傾向過度濫用，進而忘記這個行為長期之後會引起的負面後果，這樣的行為可以分為個人層次的行為，團體層次的行為，以及集體的行為；個人層次的行為常見的就是過度飲酒、物質濫用、吸菸等，在團體的層次常見的行為就是個人不想被牽涉其中或是個人被立刻受到影響的程度不大而對於某些影響大眾的公共事務漠不關心，在集體的層次上常見的行為就是人們濫用自然資源 (例如:水)，這些行為在短期內都可以獲得需求滿足，但是長期而言則會造成對生活與自然環境不良的後果 (Johnson, 2017; Platt, 1973)。Platt (1973) 認為掙脫社會束縛的方法，就是將長期的影響馬上轉成立即的影響，增加獎勵或是處罰的方法來修正行為，改變長期影響後果本身的本質，運用削弱某些行為的方法避免長期不量後果的產生，運用外界的力量修正增強行為的增強物。此外針對長期飲酒的行為，Platt (1973) 指出，這是一種多重束縛的結果，一開始是飲酒者本身被生理上對於酒精的需要所束縛，接著飲酒者可能因為家人或是朋友這些看不見的增強所影響而繼續飲酒，當然文化中在一些場合都需要喝酒助長了飲酒的正當性與助長製酒業者的興盛。因此Platt (1973) 認為最重要協助改善問題飲酒的方法，就是仔細分析其中助長飲酒行為產生的增強因素，逐一打破，才能改善問題。

許多西方討論問題飲酒問題的文獻，多數集中於討論飲酒是一種逃避的因應方式 (avoidance coping)。所謂逃避的因應方式意指以一種將自己與問題保持距離的因應方式，缺乏個人或是環境資源的人容易採取逃避的方式來因應問題 (Holahan & Moos, 1987)，對酒抱持正向期待、習慣採用逃避方式因應問題的人容易採用飲酒來因應問題 (Laurent, Catazaro & Callan, 1997)。Ullman, Filipas, Townsend and Starzynski (2005) 針對為何飲酒成為遭遇親密關係暴力的因應方式 (drinking to cope)，最後演變成為問題飲酒的原因提出進一步解釋，Ullman et al. (2005) 認為，人類通常會採用逃避的方式來避免或是減低負面情緒，甚至降低壓力，可惜的是，這是沒有任何效果的方式，採用飲酒來因應問題就是逃避的方式，久之就演變成問題飲酒。額外的一個可以參考的研究，是 Ullman and Najdowski (2010) 研究有問題飲酒的性侵害女性倖存者的求助行為，發現如果女性倖存者認知上以逃避方式來因應創傷，那麼就不容易求助甚至根本就逃避問題。協助的方法包括改變認知以及增加女性倖存者的個人或是環境的資源，這個角度同時也呼應全面完整方法以及社會束縛理論的建議，協助女性倖存者增加資源、消除環境中增強喝酒的因子、改變認知並發展有效的因應方式是重要的實務工作。

陸、討論與對社會工作實務建議

前述西方的文獻顯示，暫時飲酒麻痺遭遇親密關係肢體暴力的創傷，是某些缺乏因應方法、童年家中有人以飲酒來因應問題的女性倖存者容易採取的因應方法，且持續遭遇親密關係暴力，飲酒的頻率就會上升成為問題飲酒，進而引發生理、心理、社會方面諸多問題。如果不加以協助處理，就會形成惡性循環。因此協助這類型女性倖存者發展有效、正面的因應親密關係衝突或是親密關係暴力的方法、資源與認知，並打破兩者之間的惡性循環是主要的處遇重點。

前述西方文獻理論是否適合或是如何用來了解臺灣親密關係暴力女性倖存者？筆者嘗試從以下方向來思考。臺灣文獻指出，臺灣親密關係暴力女性倖存者面對男性伴侶使用權力不當對待，兩人之間無法有同理、情感相互交流的關係，又無法離開這個關係時，只能採取某些負面因應方式，例如：自殘、精神狀況出問題等，讓她們還可以繼續留在關係中 (劉珠利, 2012)，然而女性的負面因應方式卻經常成為問題的焦點，也因此男性伴侶就藉機淡化他們的暴力行為 (Liu, 2016)。臺灣親密關係暴力女性倖存者缺乏因應人際關係 / 親密關係衝突的有效方法 (劉珠利, 2012)，與前述西方文獻 (Covington, 2008; Temple et al., 2008) 指出有問題飲酒的親密關係暴力女性倖存者缺乏有效因應人際衝突方法的發現一致，顯示發展有效因應人際關係 / 親密關係衝突的方法，是親密關係暴力女性倖存者普遍的需要。

臺灣文獻也指出，臺灣親密關係暴力女性倖存者通常：缺乏經濟、工作、財產等有形資源，缺乏社會支持網絡提供情緒、心理上的支持，再加上求助於警政或是司法等正式系統時因遭遇挫折而退縮（劉珠利，2012），因此這類型女性倖存者經常處在缺乏個人或是環境資源的狀態中。西方文獻指出，缺乏個人或是環境資源，又陷在高度負面情緒無法維持正常功能的人，通常會採取逃避的方式來因應問題，喝酒就是一種逃避的方法（Ullman et al, 2005; Kaysen et al., 2007）。從前述心理學的逃避因應方式的角度來看臺灣親密關係暴力女性倖存者的處境，可以發現她們的處境的確存在不少讓她們最後採取逃避的因應方式的危險因子。逃避的因應方式種類很多，西方文獻解釋採取喝酒為逃避方式跟環境中的人喝酒有密切的關係，從小觀察模仿母親在遭受暴力對待之後，以飲酒來因應（Clark & Foy, 2000; Jacob & Jacob, 2016），或是與周圍的人一起喝酒，而喝酒之後帶來短暫讓她們忘記痛苦的快樂，但是忘記喝酒長期累積的後果以及問題並未解決的事實（Johnson, 2017; Platt, 1973）。臺灣並未有相關文獻討論親密關係暴力女性倖存者採取飲酒來因應的原因的文獻，而且臺灣文化並不容許女性喝酒，所以女性倖存者為何採取喝酒作為逃避因應方式呢？筆者嘗試從實務工作中的案例來分析成因。臺灣實務工作中常發現這一類型女性倖存者有些是從事俗稱八大行業的女性、有些是經營小吃店必須跟顧客喝酒以穩固生意的女性、或是常跟家人朋友一起喝酒的原住民女性等，酒在這

類型女性的生活中容易取得，所以當她們缺乏有效因應方式時，飲酒就成為立刻可以獲得並採取的方式，短暫的讓她們忘記痛苦。但是當女性倖存者從酒醉中醒過來之後，發現問題不但沒有解決，甚至因為酒醉又製造額外的問題，讓清醒後的世界更加混亂，又陷入憂鬱、焦躁的情緒之中無法掙脫，實務上的個案的確也證明了問題飲酒與親密關係暴力之間是一個無止盡的循環。然而不同於西方文獻所說的是，西方親密關係暴力女性倖存者多數是模仿母親的行為而造成採取飲酒的因應模式，而臺灣這類型女性倖存者飲酒與她們的職業、種族、及社會階層因素有關，是臺灣實務工作上要考量的因素。

綜合前述的討論，西方文獻對照臺灣相關文獻，釐清了臺灣有問題飲酒的親密關係暴力女性倖存者的經驗脈絡，同時前述的討論也直指這類型女性倖存者需要重新發展有效的人際關係/親密關係衝突的策略，並增加個人與環境資源，讓她們不再一味採用逃避/飲酒的方式來因應問題。

根據前述段落所討論的結果，筆者嘗試對協助臺灣有問題飲酒的親密關係暴力女性倖存者提出以下的處遇策略：

1. 協助女性倖存者了解喝酒來因應問題無法解決問題，與女性倖存者共同討論因應親密關係衝突/親密關係暴力的方法有哪一些，共同選擇適當正向的因應方法。

2. 仔細分析女性倖存者環境脈絡中

增強選擇飲酒的增強因子，例如：朋友、職業等，找出打破這些因子增強功能的方法，並找到替代的增強因子，使女性倖存者脫離享受酒精所帶來的短暫快樂。

3. 與女性倖存者發展安全計畫 (safety plan) 時，也同樣必須將前面所找到的女性倖存者環境中增強喝酒的增強因子一併納入，安全計畫除了增加女性倖存者人身安全的計畫之外，也必須增加消除喝酒的增強因子計畫。

4. 增加女性倖存者所需要的個人或是環境資源，例如：連結社會網絡支持女性倖存者，讓她們有問題時可以獲得心理支持或是實質問題討論機會。

5. 實務工作者在協助女性倖存者時，與女性倖存者建立賦權 / 培力、滋養、溫暖關懷的協助關係是非常關鍵的成功因素。

飲酒與親密關係暴力之間的糾纏令實務工作者頭痛與無力，期待前述的討論建議能夠為實務工作者提供一個具體可行的方向。更期待未來能有這個主題的實證研究發表。

(本文作者為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關鍵詞：問題飲酒，親密關係暴力，女性倖存者

參考文獻

- 平語晨 (2018)。《吞雲吐霧、喝到酒精中毒—透過身體毀壞展現陽剛氣質的男性壓迫》。
網址：<http://www.google.com/amp/s/www.thenewslens.com/amparticle/79222>. 瀏覽日期：2018年12月25日。
- 高靜懿 (2007)。《探討臺灣原住民問題飲酒者之求助行為》。網址：<http://was.most.gov.tw/WAS2/Award/AsAwardMultiQuery.aspx> 瀏覽日期：2018年10月11日。
- 陳筱萍，曹桂榮，周煌智，黃志中，吳慈恩 (2008)。〈參與戒酒方案男性婚姻暴力加害人飲酒行為形成歷程之初探〉。《亞洲家庭暴力與性侵害期刊》，第4卷，第1期，頁50-84。DOI:10.29804/AJDVSO.200808.0003
- 陳秋瑩、王增勇、林美薰、楊翠娟、宋鴻樟 (2006)。〈原鄉的家庭暴力及受暴婦女求助行為之探討—比較原漢之差異〉。《臺灣公共衛生雜誌》，25(1)，頁65-74。DOI:10.6288/TJPH2006-25-01-07
- 陳娟瑜 (2018)。《童年逆境經歷與青壯年問題飲酒：生命歷程觀點》。網址：<http://was.most.gov.tw/WAS2/Award/AsAwardMultiQuery.aspx> 瀏覽日期：2018年10月11日。
- 國家衛生研究院 (2018)。〈臺灣精神作用性物質的現況〉。《國家衛生研究院電子報》。網址：http://enews.nhri.org.tw/enews_list_new2_more.php?showx=showarticle&article_idx=8120. 瀏覽日期：2018年10月2日。

- 衛生福利部保護司 (2018a.)。〈家庭暴力事件通報案件統計〉。網址 :<https://dep.mohw.gov.tw/DOPS/lp-1303-105-xCat-cat01.html> 瀏覽日期：2018 年 11 月 12 日
- 衛生福利部保護司 (2018b.)。〈加害人處遇〉。網址 :<https://dep.mohw.gov.tw/DOPS/lp-1303-105-xCat-cat01.html> 瀏覽日期：2018 年 11 月 12 日
- 衛生福利部 (2018c) 。〈家暴防治〉。網址： <https://www.mohw.gov.tw/cp-190-231-1.html> 瀏覽日期：2018 年 11 月 30 日
-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2016) 。〈家庭暴力事件通報被害及加害人概況〉。網址： http://www.mohw.gov.tw/CHT/DOS/Statistic.aspx?f_list_no=312&fod_list_no=4188 瀏覽日期：2016 年 12 月 7 日
- 邱泯科 (2014) 。酒與茶：中產階級女性的飲用選擇。 *Journal of Chinese Dietary Culture*, 10(2), 33-62.
- 梁振翊 周肇茂 何佩珊 謝天渝 楊奕馨 (2004) 。〈臺灣地區飲酒盛行率調查報告〉。《臺灣口腔醫學衛生科學雜誌》，第 20 卷，第 2 期，頁 91-104. DOI: 10.7059/TJOMHS.200410.0091.
- 劉珠利 (2012) 。〈臺灣社工員協助婚姻暴力受害女性案主經驗之研究——個人際取向的觀點〉。《聯合勸募論壇》，第 1 卷，第 1 期，頁 131-157。(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NSC96-2412-H-029-006 MY2)
- Barbara, A. M., McCrady, S., Epstein, E.E. & Cook, S. M. (2010). Men' s Avoidance Coping and Female Partner' s Drinking Behavior: A High-Risk Context for Partner Violence?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25, 679-687. DOI:10.1007/s10896-010-9327-3
- Barnett, O. W. & Fagan, R. W. (1993). Alcohol Use in Male Spouse Abusers and their Female Partners.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8(1), 1-25.
- Bogren, A. (2011). Gender and alcohol: the Swedish press debate. *Journal of Gender Studies*, 20(2), 155-169. DOI:10.1080/09589236.2011.565196.
- Caetano, R., Nelson, S. & Cunradi, D. (2001).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Dependence Symptoms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from Drinking among White, Black and Hispanic Coupl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American Journal on Addictions*, 10(Suppl.): 60-69.
- Chervenak, L. & Leralta, R. L. (2011). *Alcohol and Victims of IPV: The Role of Heavy Episodic Drinking in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Paper presented at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2011 Annual Meeting. 1-23.
- Clark, A. H & Foy.D.W. (2000). Trauma Exposure and Alcohol Use in Battered Wome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6(1), 37-48.
- Cohen, A. M., McCrady, B. S., Epstein, E. E. & Cook, S. M. (2010). Men' s Avoidance Coping and Female Partner' s Drinking Behavior: A High-Risk Context for partner

- Violence?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25, 679-687. DOI: 10.1007/s10896-010-9327-3
- Covington, S. S. (2008). Women and Addiction: A Trauma-Informed Approach. *Journal of Psychoactive Drugs, SARC Supplement 5*, 377-385.
- Costanza, R. (1987). Social traps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BioScience*, 37(6), 407-412.
- Desai, S., Arias, I., Thompson, M. P. & Basile, K. C. (2002). Childhood victimization And subsequent adult revictimization assessed in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women and men. *Violence and Victims*, 17(6), 639-653.
- Devries, K. M., Child, J. C., Bacchus, L. J., Mak, J., Falder, G., Graham, K., Watts, C. & Heise, L.(2013).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victimization and alcohol consumption in wome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Addiction*, 109, 379-391.
- Hankin, A., Smith, L. S., Daugherty, J. & Houry, D. (2010). Correlation between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Victimization and Risk of Substance Abuse and Depression among African-American Women in an Urban Emergency Department. *Western Journal of Emergency Medicine*, XI(3), 252-256.
- Holahan, C. J. & Moos, R. H. (1987). Personal and Contextual Determinants of Coping Strategi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2(5), 946-955.
- Humphreys, C., Regan, L. River, D. & Thiara, R. K. (2005). Domestic Violence and Substance Use: Tackling Complexi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35, 1303-1320.
- Hutchinson, I. (1999). Alcohol, fear, and woman abuse. *Journal of Sex Roles Research*, 40, 893-920.
- Jacob, L. & Jacob, J. (2016). The Feminization of Alcohol use Disorder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Women: “Sweet, Pretty and Pink”. *Gender & Behaviour*, 14(1), 6900-6909.
- Javaid, A. (2015). The Role of Alcohol in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Causal Behaviour or Excusing Behaviour? *British Journal of Community Justice*, 13(1),75-92.
- Kaysen, D., Dillworth, T. M., Simpson, T., Waldrop, A., Larimer, M. E. & Resick, P. (2007). Domestic Violence and Alcohol Use: Trauma-related Symptoms and Motives for Drinking. *Addict Behavior*, 32(6), 1272-1283.
- Kaysen, D., Atkins, D. C., Moore, S. A., Lindgren, K. P., Dillworth, T. & Simpson, T. (2011). Alcohol Use, Problems, and Course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 Prospective Study of Female Crime Victims. *Journal of Dual Diagnosis*, 7(4), 262-279. DOI:10.1080/15504263.3011.620449
- Laurent, J., Catazaro, S. J. & Callan, M. K. (1997). Stress, Alcohol-related expectancies and coping preferences: a replication with adolescents of the Cooper et al. (1992) model.

- Journal of Studies on Alcohol*, 58(6), 644-651.
- Lemon, S. C., Verhoek-Oftedahl, W. & Donnelly, E. F. (2002). Preventive Healthcare Use, Smoking, and Alcohol Use among Rhode Island Women Experiencing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Journal of Women's Health & Gender-Based Medicine*, 11(6), 555-562.
- Lesch, E. & Adams, A. R. (2016). Couples living with and around alcohol abuse: a study of a farmworker community in the Cape Winelands, South Africa.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156, 167-174. DOI: 10.1016/j.socscimed.2016.03.030.
- Liu, Chu-Li (2016). Culture or Oppression? An anti-oppressive perspective on women with mental health problems who survived their male partners' violence. *Socialno delo Journal*, 55(5-6), 269-280.
- Lipsky, S., Caetano, R., Field, C. & Larkin, G. L. (2005). Is There a Relationship between Victim and Partner Alcohol Use During an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Event? Findings from an Urban Emergency Department Study of Abused Women. *Journal of Studies on Alcohol*, May, 407-412.
- Lipsky, S., Caetano, R., Field, C. A. & Bazargan, S. (2005). The Role of Alcohol Use and Depression in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mong Black and Hispanic Patients in an Urban Emergency Department.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Drug and Alcohol Abuse*, 31, 225-242. DOI: 10.1081/ADA-200047923.
- Lipsky, S., Kernic, M. A., Qiu, Q., Wright, C. & Hasin, D. S. (2014). A Two-Way Street for Alcohol Use and Partner Violence: Who's Driving It?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29, 815-828. DOI: 10.1007/s10896-014-9635-0
- Meyer, A. (2010). "Too Drunk to Say No" Binge drinking, Rape and the Daily Mail. *Feminist Media Studies*, 10(1), 19-34. DOI: 10.1080/14680770903457071.
- Miller, B. A., Downs, W. R. & Gondoli, D. M. (1989). Spousal violence among alcoholic women as compared to a random household sample of women. *Journal of Studies on Alcohol and Drugs*, 50(6), 533-540
- Myers, U. S., Browne, K. C. & Norman, S. B. (2015). Treatment Engagement: Female Survivor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n Treatment for PTSD and Alcohol Use Disorder. *Journal of Dual Diagnosis*, 11(3-4), 238-247.
- National Institute on Alcohol Abuse and Alcoholism (2018). Drinking Level Defined. Available online: <https://www.niaaa.nih.gov/alcohol-health/overview-alcohol-consumption/moderate-binge-drinking> Retrieved on Nov. 28, 2018.
- Pengpid, S. & Peltzer, K. (2017).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Victimization and Perpetration among Female Youth and Adults in Myanmar. *Gender & Behavior*, 15(3), 9303-9312.

- Platt, J. (1973). Social Traps. *American Psychologist*, August, 641-651.
- Rehabcenter.net (2018). The definition of “problem drinking” . Available online: <http://www.rehabcenter.net/problem-drinking/>. Retrieved on Oct. 29, 2018
- Shannon, L., Logan, TK, Cole, J. & Walker, R. (2008). An Examination of Women’ Alcohol Use and Partner Victimization Experiences among Women with Protective Orders. *Substance Use & Misuse*, 43, 1110-1128. DOI: 10.1080/10826080801918155.
- Sprunger, J. G., Eckhardt, C. I. & Parrott, D. J. (2015). Anger, problematic alcohol use, an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victimization and perpetration. *Criminal Behavior and Mental Health*, 25, 273-286.
- Temple, J. R., Weston, R., Stuart, G. L. & Marshall, L. L. (2008). The longitudinal association between alcohol use an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mong ethnically diverse community women. *Addictive Behaviors*, 33(9), 1244-1248.
- Ullman, S., Filipas, H. H., Townsend, S. M. & Strazynski, L. L. (2005). Trauma Exposure,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d Problem Drinking in Sexual Assault Survivors. *Journal of Studies on Alcohol*, 66(5), 610-619.
- Ullman, S. E. & Najdowske, C. J. (2010). Alcohol-Related Help-Seeking in Problem Drinking Women Sexual Assault Survivors. *Substance Use and Misuse*, 45, 341-353.
- Ullman, S. E. & Sigurvinsdottir, R. (2015). Factors related to intimate partner and sexual violence.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d Drinking among Victims of Adult Sexual Assault. *Journal of Aggression, Maltreatment & Trauma*, 24, 117-130. DOI: 10.1080/10926771.2015.996312.